

第十一話

同仁堂的繼承與發揚者

——樂達義和樂松生父子



樂達義

筆者的十伯父樂達義（一八八一—一九四七年），號印蓀，中等身材，較胖，一張國字臉，短平頭，隆鼻子架一副老式近視鏡，春秋時節常戴一頂紅疙瘩帽盔，喜穿中式服裝，腳著布鞋，年節喜壽期間都穿袍子馬褂。在接管同仁堂之前，曾在北京員警廳任督察長之職。

樂達義接管同仁堂

自一九〇七年曾祖母去世後，家族內再沒有一個能像她老人家那樣有威信、說話算數的人了。此後的二十幾年中，筆者家伯叔昆仲之間勾心鬥角，大家仿效印川公寄賣丸散擠走外股的辦法，各自安插親信售賣個人的「加料」丸散來為自己牟利。先後由我祖父（二房）及大房、三房的長輩管理同仁堂，他們無一不在掌權時有肥己行為，名義上雖然早就議定由四大房共管，但依然是各自為政，明爭暗鬥，矛盾重重。直到一九三一年樂達義接管同仁堂，才有了真正的四大房共管制度。

四房共管即由四大房各出一人，所有銀錢帳目出入都要蓋四個圖章。這樣正規的管理制度一直延續到一九四七年樂達義病逝。十伯父大公無私，在管理同仁堂的十幾年裡公私分明，辦事認真，堪稱樂氏家中的楷模。而且他還以助人為樂事，他去世時，我家老

保姆趙氏說：「十老爺可真是好人啊，他是我們窮人的恩人哪！」

筆者在拙文〈樂家老鋪的譜系與軼事〉（《中華醫史雜誌》一九九三年第二十三卷第二期）一文中有這樣的記述：「達仁之弟達義熱心公益，樂於助人，從另一角度輔助了同仁堂及達仁堂。」

遵從祖訓，任人唯賢

依照五世祖樂鳳鳴「遵肘後，辨地產，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，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」之遺訓，十伯父在經營同仁堂時兢兢業業，一絲不苟，經常到藥廠去視查，檢查藥品品質。一天他服用本堂所產的羚翹解毒丸時發現有細小藥渣，他立刻意識到近期生產的丸散中品質有些問題，馬上趕到藥廠仔細檢查各道工序。在藥材粉末過羅時，發現剩渣比平時的大，看到八十目藥羅有並絲情況，致使篩孔大小不勻。他毫不遲疑地用袋內小刀割破廠內所有舊羅，立刻更換新羅。藥工們全都伸出大拇指讚揚他這種認真負責的精神。

筆者在孩提時，於同仁堂新辦公室內看到掛在牆上的一塊小黑板，是吊蠟皮人員的考核表。其左邊是吊蠟皮藥工姓名，右邊是幾項考核內容，有蠟皮的形狀、顏色等，由筆者父親他們十八位負責人驗收，給吊蠟皮的藥工打分。記得評分中有一項是「汗」，這和他們所得另錢（一種與品質、數量掛鈎的獎勵辦法）直接掛鈎。

有一次藥商拿來一塊方形的牛黃給十伯父看。他一時難以判定真假，就問：「十七老爺來了沒有？給他看看。」父親拿到貨，仔細看了一番，認為該貨的顏色、質地都對，又嚐了嚐，氣微腫，味略澀，稍苦回甜，認定這是真貨牛黃，就對十伯父說：「嗯，留下巴！」

四房的人真團結

以七伯父樂達仁及十伯父樂達義為首，四房的兄弟們齊心協力，為創建樂家經營藥業的新局面而努力。他們以四房名義開設了達仁堂，生產的藥品講究品質第一，優貨高價。七伯父常說：「我們不要自己說話，而要優級貨物來叫人。」俗話說：「人叫人千言不語，貨叫人一叫就來。」除同仁堂老藥鋪外，達仁堂在樂家老鋪中排名第一。

樂達義十六歲時與同齡夫人結婚，夫妻感情極好。他們先得三女，當時有人勸達義納寵，他拒絕了，後來不久松生就去世了。老四房兄弟多子艱，四人中有三人都是一子單傳，松生也僅有獨子士驥一人。十伯父對子孫更是寵愛有加，病重時還不時與在天津的孫兒士驥通電話。

樂達義的日常生活

十伯父喜歡兩個姪子，元可和筆者。十伯父叫：「老大！」佑申大哥趕緊過去，問：「十叔，您叫我？」十伯父卻指著元可說：「我叫他呢！」十伯父和筆者有種默契，他用手在筆者大腿擰一下，我就立即說些近日趣聞，這還有個名堂，叫做「哥兒搭」。筆者懷疑這是滿族或蒙族親屬間的一種俗稱。

樂達義常與戲曲界、曲藝界著名演員交往，著名京劇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雲即是他的義子，他還與相聲名家侯寶林、梅花大鼓名演員花小寶相熟。十伯父說：「我都不敢上他們曲藝廳去，一到他們那裡就讓我點段子。」四哥樂錡結婚時請了一台曲藝堂會，郭榮啟的《打牌論》，逗得大家大笑不已，女眷更是笑得前仰後合，弄得演員在台上有些發懵，感到有點莫名其妙。原來是郭榮啟長得與孝先二哥有些相似。花小寶的紅樓段剛一開口，孝先就嚷：「來段老媽上京吧！」十伯父就說：「還算好，我這裡女傭沒有一個是三河縣的人！」新郎曾在美國海軍中服役，那天有一位美國軍官前來參加四哥的婚禮，他曾是新郎的上司。在彩孟表演戲法時，四哥就淘氣地對他說：「把小玩藝兒往外國人鼻子上貼！」連說幾次，彩孟佯作未曾聽見，避免了一次對外賓不禮貌的行為。

十五伯父去世時，十伯父用藍綢子紮在帽盔的紅疙瘩上以示哀悼。當他見到元可時，

大叫一聲「姪兒啊！」就大慟起來。當時正是日本侵華後期，十伯父提醒元可說：「如遇空襲，先顧活人，再顧死人。」

我所見到的樂達義喪儀

十伯父伉儷去頤和園過他們的金婚紀念日，當晚十伯父就腹瀉，自此病倒，延至冬季就與世長辭了。當時筆者想十伯父一向疼筆者，與老人家這是最後一面，筆者一定要去，於是參加了十伯父的入殮儀式。松生二哥熱孝在身，當天他理了很短的頭髮（按舊日習俗，父母喪百日內不得理髮刮鬚）。入殮之前，四伯父樂達聰（號敬宇）扶杖前來，自始至終未發一言，用手撫平逝者衣被，又敲敲棺材外板，深情地看了一眼已故的老兄弟，算是最後告別，然後默默離去。父親說四伯父年事已高，不能過於悲痛。入殮儀式開始了，殯儀人員要松生用十伯父生前常使的茶缸，用棉花蘸缸內的水為十伯父最後一次淨面，然後將殮衣緊緊地紮裹在亡人身上。開弔那天，三哥樂崇輝和我奉命陪頭，我們換上藍布大褂來到靈堂前面，開始時我陪弔客一起向上磕頭，母親立即糾正我說：「你們這是替亡人向弔客還禮，所以要面向客人行禮。本來應該是兄弟陪頭，現在此任務交付你們，已經是降格以求了！」當天參加弔唁的客人有三百多位，其中有一位是同仁堂職工，邊走邊哎喲，樣子非常沉痛，元可告訴筆者，那是我們的表兄。筆者陪頭的一位老者，原

來是四大名醫之一的汪逢春。著名京劇演員筱翠花也來了，坐在棚內板凳上，一邊咬著他戴的黑絲絨圍脖，一邊埋怨說：「尚（小雲）老闆也真是的，今兒個沒露（面），咱們和十老爺可不是泛泛之交啊！」

堂兄樂松生

筆者堂兄樂松生（一九〇八—一九六八年），原名樂鏗，中等身材，較胖，面貌俊朗，留背頭髮式，戴一黑邊眼鏡，儀表堂堂，很有派頭。他為人厚道，樂善好施，寬以待人。趕上飯口，他常和達仁堂職工一起就餐，又讓飯館送來兩菜由他請客。職工家中有紅白喜事，他也隨份子，並拿雙份錢。據老人家傅海祿介紹，松生兄孩提時也是在老宅裡長大。下大雨時，他們把祖先堂院內溝眼堵住，他與廖氏表兄弟——外號大料豆和小料豆，一起嬉戲。松生先坐在木板上，由廖氏兄弟來推，然後再輪換，享受「划船」之樂。儘管弄得滿身是水，表兄弟卻玩得興高采烈，一玩就是一兩個小時。

樂松生有較高的文化水準

松生的親伯父樂達仁在清光緒時，就作為海關道隨員到德國遊學四年，松生的父親樂

達義在民國早期在英國遊學年餘。因此，樂家四房人早就有了開闊的眼界，考慮問題也就更加全面周到了。當時我們二房還處在墨守成規的傳統觀念中，父母喪要在家守制三年，筆者父親即因此輟學，中斷了初中學業，他填表常寫私塾八年。而松生二哥先上北京匯文中學大學堂（今匯文中學），該校是美國教會學校，民主氣氛濃厚，地下黨在匯文也非常活躍。此時，松生接觸到很多進步師生，也讀到很多進步書籍。他從匯文中學畢業後還希望進一步深造，又到天津育才商業學校學習商業管理及會計等學科。他能熟練地打算盤，他的文化程度大體相當於今天的大專水準。

樂松生對中藥業的貢獻

樂松生對中藥業最大的貢獻在於成立了中藥提煉廠。樂松生十七歲開始，去天津隨伯父樂達仁學習經營達仁堂藥店，幾年後他已經是行家裡手了。樂達仁早已意識到中藥必須改進，使它走向科學化的道路，而樂松生耳濡目染也深有此感，他們的做法大體符合今日中西醫結合的方針。達仁堂曾與德國拜耳藥廠就合併一事商量多時，雖未成功，但樂達仁要走哪條路是顯而易見的。

解放初期，彭真市長就鼓勵樂松生試辦中藥提煉廠，以便改進中藥製造的程式並提高品質。一九五二年松生請來了北醫藥學系鄭啟棟教授，成立了國藥改進研究室，還分來

兩名藥學系畢業生，他們開始試製銀翹解毒片、黃連上清片等四種產品。一九五四年正式改名為達仁堂中藥提煉廠，工人增至二十三人，產品又增加藿香正氣片及六味地黃片等五種。古老的中藥廠開始使用粉碎機及壓片機。幾年後，達仁堂提煉廠合併為同仁提煉廠，成為同仁堂的一部分。此舉把同仁堂由一個過去家族式的買賣，過渡到企業化股份公司的經營，如此巨大的改變真是可喜可賀的一件大事。

推舉樂松生為北京同仁堂經理

十伯父樂達義管理同仁堂鋪務十幾年，業績良好，被家人尊稱為「主席」。一九四七年樂達義去世，大家公推樂松生及樂益卿為正、副負責人。抗日戰爭勝利後，同仁堂又遭受到國民黨的巧取豪奪，還有金元券的慘痛洗劫。當時同仁堂有二千一百七十種成藥核准為合格品出售，但每種成藥每月要交五元稅款，一九四八年八月又進一步限價，如茵陳酒限價每斤一元，酒很快被賣光，但無法再製了。這時，松生不得已採購黃金、美鈔及銀元以保存市值，但每天爛掉的金元券還是不計其數，加上北京解放在即，京城被圍，同仁堂的經營面臨困境。為了減少職工的損失，同仁堂只得經常發糧、煤、布給他們作為生活補貼。解放前夕，同仁堂已到了外強中乾的地步了。

解放初期，同仁堂陷入無人管理的狀態。樂松生當時不瞭解黨對工商業者的態度，他

跑到天津去觀望，一是看黨的政策如何，二是看職工對他的態度有無改變。後來同仁堂的勞資糾紛一直未解決，各房代表與同仁堂職工代表均未達成協議。職工代表指名要他回京談判，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此次談判竟達成協議，並推選他為同仁堂經理。他回應黨的號召帶頭走社會主義道路，從而改變了生產關係，使同仁堂的生產力得到空前的發展。

向毛主席報喜

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，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同仁堂經理樂松生，他是代表北京市工商聯給毛主席送喜報的。當時的樂松生激動得說不出一句話來，還是毛主席先開了口，說了三句話：「樂松生先生，您好！工商業者好！同仁堂好！」這時，松生才問候了一句毛主席的健康。事後，松生自豪地說：「我無法形容當時的興奮與喜悅！」此前，他於一九五五年被選為北京市副市長，協助市長做些工作。彭真市長考慮到他的經歷，善意地指出：「他會吃，也懂得玩，就讓他分管餐飲業和公園吧！」通過和高級領導同志經常在一起工作，松生兄在各方面都有了明顯的進步，不但要經常接待中外友人，還要不時地作報告。在彭真物色副市長人選時曾到過樂家，記得他當時一步跳上三層台階時，還帶著一個十二、三歲的男孩。彭真解釋說：「戰爭年代，我們有個孩子不容易啊！」舐犢之情溢於言表。

松生的日常生活

松生喜讀古典文學，本意學醫，後遵父命到天津協助伯父經營達仁堂藥店。他二十三歲與梁君謨女士結婚。梁女士貌美時尚，有「摩登」之雅號，有一獨子樂士驥。

松生樂善好施，資助了別人，自己卻經常處於拮据狀態。他每從達仁堂取一筆款，達仁堂則要同時取出四筆款給四房的其他兄弟，幾年後竟為久居美國的樂錡存下十萬美金。

中藥和京劇都是國粹，樂家人和樂家老鋪的職工們喜愛京劇的大有人在，大家與著名京劇演員來往頗多。十伯父樂達義為了讓兒子松生體魄強壯，特請富連成科班著名演員茹富蘭教授松生練習武功。四爺爺先其母而逝，留下中年的四奶奶一人撫養子女長大，頗為不易。故趁松生訂婚之際，兒孫合演一齣《青石山》，為博老人一笑。七伯父樂達仁飾關公，十三伯父樂達明飾呂洞賓，新郎樂松生飾關平。松生兄武功純熟，扮相英俊，博得一片喝彩之聲。

松生兄還幫過筆者夫妻一個大忙，把筆者妻子從天津調到北京。二十世紀五〇、六〇年代往北京調進一個人，想上戶口真是難上加難。筆者夫婦二人在京津兩地已經跑了六年，一九六三年筆者想自己解決這個問題，就奔走了八個月毫無進展，不得已求到松生兄。他批了個條子，接待筆者的人員馬上改變了口吻，說什麼「特殊情況特殊處理嘛！」當筆者和與我妻對調的女士會面時，筆者感慨地想：「你是沾了我們的光呢，還是你也

走了大後門呢？」

我岳父賈富文（公安醫院院長）和十一哥樂肇基是中學同學，他和樂松生也是多年摯友。松生訪問阿爾巴尼亞時，還帶給賈富文一套酒具。一天，松生去天津，他們三個聚在一起提起筆者父親，松生說：「我們這位叔叔啊，到哪兒講話就是這三句，一是黨的領導，二是群眾路線，三是個人水準很差。」松生兄本意是笑話筆者父親，豈料我岳父和大哥都連聲說：「這樣好，不犯錯誤！」

解放後，松生兄一直得到彭真市長的保護。五反時，他與其妹樂倩文被達仁堂職工叫去，讓他們查帳交代問題，過了一夜就被彭真保了出去。文化大革命時，紅衛兵問松生與彭真的交往，一聽說彭真到他家去過三次，松生兄這就算有罪了。一九六八年四月，樂松生不幸去世，終年六十歲。





樂士驤回國省親與樂氏族人的合影（二〇〇一年攝）



樂松生代表北京工商業者，向毛主席敬獻工商業改造勝利喜報。（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）



筆者的堂兄樂松生



北京同仁堂提煉廠成立十週年合影（一九六二年）